

目 录

九世班禅出逃内地前后·····	团康·洛桑德吉遗作 (1)
擦珠·阿旺洛桑小传·····	文史资料编辑部 (15)
班禅行辕与刘文辉廿四军之战·····	旦增加措 (20)
十四世达赖新宫修建情况·····	洛桑曲增 (30)
昂钦达巴堪布史略·····	扎什伦布寺历史编写小组 (39)
迎请九世班禅转世灵童记·····	德森·班久仁次遗作 (45)
前后藏失睦初因·····	彭绕·仁青朗杰 (57)
历世热振活佛简史·····	热振·单增晋美 (62)
我进藏的第一课·····	柳升祺 (68)
我任申扎宗本记事一二·····	阿旺曲达 (78)
我出任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期间·····	然巴·朗加旺堆 (82)
藏军史略·····	陈 炳 (85)
回忆修建日定公路·····	多旦·洛桑次仁 (100)
对峙克节朗——回忆1962年保卫祖国边疆英勇献身的人们 ·····	杨一真 (103)
日喀则伪人民会议·····	萨江·朗杰才旦 (117)



九世班禪遺容

九世班禅出逃内地前后

团康·格桑德吉 遗作

编者按：此文是作者在病危时于病榻前撰写的。

一、九世班禅因何逃往内地

自1920年起，噶厦政府对后藏扎什伦布寺施加压力，向班禅辖地征兵、征税、征粮、征劳役。一方抵制，一方强征。其后愈演愈烈，以致双方弄成水火难以相容之地步。现将其主要情节分述如下：

不合理的军费负担

1791年（清乾隆56年，藏历第十三甲子的铁猪年），廓尔喀（尼泊尔）发兵入侵西藏，攻占了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拉章为了迅速将廓尔喀侵略军驱逐出境，请求噶厦政府派兵救援，并表示对来援部队所需的军饷粮秣，尽所有财力暂行垫付。

战争结束后，扎什伦布寺拉章即敦请噶厦政府结清此次战争费用，要求将垫付的军费予以退还。当时，噶厦政府对此未置可

否。后经再三催请，噶厦政府才答复：经过核算，你方应负担此次军费的四分之一。但军费总数究竟是多少？却没有公布。又经多次催问，回答只是“照旧”。双方为此争执不下，以致拖延下来。

1888年（藏历第十五甲子的土鼠年）和1904年（藏历第十五甲子的木龙年），英帝国主义曾两次发动侵略战争。1912年（藏历第十五甲子的水鼠年），清朝驻藏的绿营官兵和噶厦政府之间爆发了一次内部战争，噶厦政府就把这三个时期的战争军费开支公布了一个总数为一〇八万克青稞。通知扎伦扎萨按照往昔“常规”，承担全部军费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是从古至今，从未有过的先例。实际上，班禅辖地也不占全藏的四分之一。尽管我们倾诉了种种苦衷，噶厦政府却一直不予理睬，还一个劲儿地逼讨这批款额。

沉重的徭役赋税

历来班禅辖区内的僧俗官员、百姓和庄园、土地所承担的赋税、差役均向扎伦扎萨缴纳，从无支应噶厦政府的先例。这条法规始于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之时。早在那时公布的“协帮法令”中就说过：“班禅佛爷不同于凡响，应该受到尊敬。因此，他的封地和庄园，不仅不能缴纳赋税，即便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众高声喧哗也是不能允许的”。后来的噶厦政府竟无视上述严肃的法令，不仅不尊奉，且逐步给班禅辖区的百姓增加了许多额外徭役。诸如：1793年（藏历第十三甲子的水牛年），在功德林达察任摄政时代，订立了“水牛年汉藏差役细则。细则中规定：宗属

权限内的乌拉差役，须支应马差四十九匹，驮牛差九十九头以下。凡超过规定数时，其人伕、骡马、驮牛的住宿开销、伙食柴薪、牲口饲料等等，则由扎什伦布方面负担超出部分的六分之一。1917年（藏历第十五甲子火蛇年）噶厦政府所公布的“火蛇法令”中又规定：凡江孜境内宗与宗之间应支的徭役，倘如马差不超过一百匹，驮牛不超过三百头时，须要另行再支差役，且美其名曰“国事借用”，实则有借无还。又规定扎什伦布所属的庄园与百姓应共同承担江孜境内所支应的人伕、马匹、驮牛、住宿安排、饮食柴薪、牲口饲料等开支中的七分之一。更加苛刻的是1923年（藏历第十五甲子的水猪年）的“水猪法令”中特别规定扎寺所属庄园的百姓必须遵照“铁虎测量规定”的定额缴纳土地税和应支的徭役。依照“铁虎测量规定”“冈”（一冈约合50亩地）、“顿”（两冈或四冈为一顿不等）的计算法应该是统一的，承担政府差役的大户差民和寺院的百姓，应支的差役和应缴纳的赋税，也应该完全一样。但是，由于他们的计算方法太不合理，以所撒种子数量的多寡，来确定土地面积的大小，甚至竟荒唐到瞎估而定，有的成倍地估大。噶厦政府不顾后藏百姓的死活，严令按照“铁虎测定”执行。至于被水冲刷和被石沙淤积已无法耕种的土地、“根保”（乡长）名下的份地和服兵役的人的份地，是可以按比例适当减免的。但自“铁虎测定”后，竟也要照缴土地税。这样一来，扎什伦布所属庄园的百姓，既要向本领主纳税、支差役，还得负担噶厦政府的军役、徭役、运输税、驿站接待以及不断增加的苦役苛税，等等。这一切都无处申诉，也更是不容申诉的。

被迫逃往内地

班禅辖地自清初起即归班禅，其所属各宗、谿及大小寺院的土地、庄园均由班禅扎萨委任官吏治理。宗谿收入、寺院财产、赋税徭役等，均由后藏自己管理、经营、支配，噶厦政府原本是无权过问的。在班禅未逃往内地前，噶厦政府曾派人对寺院财产和耕地进行过清理、勘测。制定了“增勘赋税粮办法”。规定测定后的土地新增税款，每年必须按期交清，关于所拖欠的军费不再另行列出，一并汇总在新测定增收的税金数额内。对于这个新规定，扎什伦布方面一再申辩，说明不该增税之理，但噶厦政府仍充耳不闻。至于这个新办法是怎样搞出来的？原来是由驻在日喀则的两位基宗（总管。一僧一俗），亲自在地边步行，以步数的多少来确定土地面积和产量。其中一位基宗是在夜间踱走计步，在地边上插上火柴棍，计算土地面积的。再以撒种数量估出“冈”、“顿”。另一位基宗的做法虽稍有不同，其本质则是一样的。这一新办法，又要我们每年增缴三万克粮食。自1922年（藏历水狗年）到1927年（藏历火兔年）的六年间计算出的税款总数，我们是根本无法缴清的。上述为数巨大的军费、税款和数不清的徭役、苦差，把日喀则的僧俗官员和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中。九世班禅正是在如此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才不得不逃往内地去的。

二、临逃之前的安排和途中情况

九世班禅临逃之前，先给四大扎仓的活佛和僧俗执事们写下

了一纸嘱托文告。内容大意是：由于噶厦政府强令扎什伦布负担巨额军费和繁重苛刻的赋税、徭役，已逼得扎什伦布的全体官民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曾经多次向噶厦政府要求减免，终未能应允奏效，为解脱众生苦难，我（班禅自称）只得去霍尔、内外蒙古等地，向施主和教徒们募化银钱，来偿还欠噶厦的债款。我走后，你们四大扎仓的全体僧俗人等，必须共同挑起重担，勤奋修持，做好佛事；所有大小寺庙的百姓，都要勤劳生产，做到照常供奉。你们要互敬互助，加强团结。无论发生什么严峻的事情，都要强自忍耐，谨慎从事，切勿有负所嘱。

班佛于1923年，即藏历十五甲子的水猪年十月，告别了扎什伦布寺轻装出发。

班禅一行，离开扎什伦布后，路经那塘、达拉、波东、波日波多果沙到达了“协”地区后，分成数批、依次前行。走在最前面的是班佛和他的两名随从。当他们走进“协”戳科村庄去讨水喝时，被一个朝过佛的小孩一眼看见。这小孩便大声喊道：“阿妈！你看！后面那个骑马的人，真象佛爷啊！”

那时，“协”地区，有一位谢通门的“谿堆”（这里的庄园是属于扎什伦布寺的，“谿堆”是扎寺委任负责行政的官员。）班禅受到了这位“谿堆”的恭迎接待。并接受了他奉献的糌粑、面粉、大米、酥油、肉、干面条、干菜和牲口饲料。还有给随行人员的鹿皮面黑羊皮里的藏袍、皮袍二十多件和几顶帐篷。这对班禅一行确实解决了大的困难。

经过“协”的羌布地方，朝北前行，几天后，到达了部落头领绕西噶尔本的辖地陶巴夏。这位噶尔本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而对班禅十分礼敬，凡所需都尽量作了补充。还派了两名骑士

护送了几个驿站的路程。

以上这些情况，被南木如宗的一个孜仲发觉，向噶厦政府汇报了。噶厦立即将他召至拉萨，关押起来，严刑审讯，受尽折磨。最后不知何因，死在狱中。

班禅一行到达下安多地方（青海玉树附近）时，在山谷地安下行帐，歇息二日。就在这里遭到了噶厦预先安排在这里的暴徒袭击。由于我们没有火力抵御，帐篷内的用具什物被打得稀烂，幸未伤人。藏军头目占堆巴率领十几名藏兵包围了帐篷。当我们讲述了与安多喇嘛接触的情形，及沿途的教徒朝拜班佛的经过后，藏军自感不能逮捕班佛及其随行人员，只好转回去了。不久便得知拉方面曾派出孜本龙夏和代本崔科等人，率藏军兼程前来拦截班佛。同时还向那仓、申扎两宗下达命令，指示其跟踪追拿，不准班禅越过藏境。因为赶不上，才收步的。当时有歌谣唱道：“龙夏号称术士，计算失误返回；崔科号称猎狗，嗅上一圈即归。”

噶厦政府还命令扎寺的昂庆达巴和四品官德夏瓦两人前往追拦，并再三交待要他们务必请班禅佛爷停止前行，返回扎寺。他俩接到命令后，私下商议，如能追上班佛，就跟随一同前往内地。因为没有追上，只得返回交差。

班佛一行继续前行。行至藏北荒原时，所带食粮耗尽，不能继续前行。便派出几批骑士，分头去寻找有人烟的地方。临行前班佛还亲自嘱咐，要大家特别注意在山坡上有白鹅卵石排成“啊”（^④）字形的地方，立即报告。果如所嘱发现，得报后，都跑去观看。按佛示挖了下去，挖出了糌粑、面粉、肉、酥油和茶叶等。这显然是先遣人员卡尔喀索本等人筹集埋藏在那里

供班禅届时救急用的，按预约做上标记。在这些食物又将用尽时，有两名骑士自告奋勇去狩猎，以猎获到的野牛及其他野物解决给养困难。这件事被班佛发觉，他本人不仅点滴不沾，还严厉斥责今后不许再这样做。当班禅大师等行至柴达木盆地时，见一支驼队迎来。骆驼驮着很多食物用品。原来他们也是奉先行官员卡尔喀索本的安排迎接班佛的。

这次随班禅一同出逃官员有：恰卜吹堪布、大索本苏努（后任班禅行辕扎萨喇嘛、也有人称罗委员）、森本（主管轿乘及穿戴的官员）噶绕、供奉堪布盘康王、孜仲当青巴·茨多（就是任大喇嘛的洛江·旺罗坚）、内侍仲雪·普布次仁、司钥（掌管寺庙财产的管家）吉宁扎堆、森成巴（绰号叫馱骡）、麻庆（即大厨司、系大喇嘛土登尼玛的老师）、俗官勒参巴扎色、苏巴哲旺、司马官江仲巴·次旺。内侍僧侣有：普旺（即后来的宫内司库）、仲罗、次仁培、阿底（即后任供奉官堪布南木·丁然巴）、阿普尔（即后来的大知宾哈东·罗桑陈列）、索本（西厢跟班）夏昌杰仲·旺堆洛布（即后来的军务处长四品官桑门巴）以及仆从、骡夫等。班佛一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祖国内地落脚。

三、九世班禅离去后的扎什伦布

班禅一行逃离扎什伦布寺后，扎寺被两位基宗（噶厦常驻日喀则的代表）发觉，立即派出人马跟踪追赶，并通过江孜的商务机构，用电话向噶厦政府禀报。这两位基宗由江孜回转扎寺，立即追究班禅出走详情，责令全寺僧众不得隐瞒，据实陈供。甚至

篡夺僧官“嘉荫”尊号（扎寺除班禅外的唯一至尊），处理全寺一切日常公务；他强令凡有关扎寺各部门和所属宗、谿的事务，都须向基宗报告，诸凡一切政教指令，均须遵照他两人的指示执行。扎寺司钥的职务也由基宗派的人接办，将布施、赋税收入和支出帐册及库房钥匙全部收去。扎寺全部财产，亦由基宗经管，上下僧俗人等，均得在他俩的管束之下行事，即使是扎萨喇嘛也得听从基宗的吩咐。

一年之后，噶厦政府又派来孜康堪钦（大堪布），封他为“三毕里图”，带了噶厦的诏书，来扎寺就任扎萨喇嘛，另派来办事人员孜敦和孜仲等约四、五人。于1925年（藏历木牛年）正式到任就职，从原基仲手中接管公章印鉴。

以前，历世班禅委派掌管政务的“嘉荫”时，都是从寺庙活佛中挑选委任的。别人有事见他，必须作揖敬礼，这是出于对活佛的尊敬，已形成了常规。这次噶厦派来的孜康堪钦，却是个贵族俗官，而且是个疯癫凶暴之徒、贪婪成性，弄得扎寺的人没有片刻安宁。为了要办事，大家不得不去见他，但都不愿作揖敬礼。这样一来，可把这位“嘉荫”惹恼了，来办事者，无不遭到他的恶毒咒骂。因为他非常凶暴，也逼得班禅的经师洛巴鼎明汗和四大扎仓的喇嘛活佛们都不得不向他作揖致敬。那么其他人又怎敢不对他诚惶诚恐呢！

这位“嘉荫”的妹妹是个尼姑。她行为不检，拿着钥匙任意到各库房开锁取物，甚至在夜间随意进出库房。她走进班禅的卧室，大模大样地一屁股坐上班佛宝座，这是佛教徒最忌讳的。陪行人员叫她不要乱坐。她问：“为什么？”回答她“这是班佛的座位！”她则答道：“班禅是僧人，我是尼姑，都是佛门弟子，

为什么不可以坐？”

不久，这位“嘉荫”呜呼哀哉了。代替他的是孜淳朱然·洛桑仁钦。他带着诏书“阿麻尔林果”和任命书于1928年（藏历土龙年）来扎寺就任。他一来就宣布说：“以往各任嘉荫，都受人们的叩头敬礼，因为他们都是活佛、喇嘛一类的人物。现在，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活佛，所以谁也不必再叩头拜揖。”从此，就再没有人对“嘉荫”行跪拜礼了。

这位“嘉荫”任职的时间最长。他装出一付对扎寺很关心的模样，对人们的态度是温良和顺。大多数人都恭敬地称呼他为“嘉荫大人”。人们也似乎觉得从丛生的荆棘上，落到了平稳的地上。

这位“嘉荫”在处理事务上，平时只用一两个堪穷、一两个孜淳，多时也不过七、八个人。在秉承噶厦政府指示要办的重大事情，需要得力人员时，就呈报请求噶厦另行委派，几乎把扎寺人员尽都搁在一边。凡人事安排等重大事宜，都由噶厦方面决定，致使扎什伦布的大小政教事宜，处于自己无权过问的地步。

噶厦政府的孜仲们，对扎寺的扎萨喇嘛及其他官员辱之为“给骡马喂草料的人”。“嘉荫”朱然·洛桑仁钦最初到扎什伦布时，并没有带来什么财产，后来，他竟跻身于大富商的行列。同样，凡是长期在后藏做过官的人，后来都变成大富豪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嘉荫”朱然·洛桑仁钦在任职期间所以得到人们赞扬，是因为他为九世班禅遗体修建了一座精美壮观的灵塔。可是，扎寺的库房却被挥霍一空了；扎寺所属的百姓被弄得一贫如洗。后来，朱然·洛桑仁钦因年事已高，不能继续承担寺院政教重任，上书噶厦请求辞职。当时扎寺的个别人竟盗用四大扎仓的名义，

向噶厦上书，写道：“……噶厦如若同意他的辞职要求，则寺庙一切事务，今后就很难推行。我们全体为此忧心忡忡，请求噶厦为我们的政教大业着想，要他照常供职……”噶厦对此批复道：

“朱然嘉荫因年事已高，难以继续担此重任。兹因尔寺四大扎仓僧众一致恳求，暂准朱然嘉荫继续供职。朱然可不必常驻机关。但为了有利于工作起见，特委派扎萨喇嘛绒白伦·土丹桑培前来协助。”1947年（藏历火猪年），绒白伦·土丹桑培来到扎寺，履行“嘉荫助理”职务。他一来到扎寺，正如谚语所说：“在霞如昌治肿瘤，由一变二〔注〕。”

过去，“嘉荫”朱然独断专行，添了助手却失掉了一半权力，不能为所欲为了，故而又二次提出辞呈，于1950年（藏历铁虎年）获准。至此，那位助理“嘉荫”竟被册封为“三吉龙图”，成为正式“嘉荫”了。

九世班禅在逃走时，留下密信要昂庆赤托达尔巴逃跑。昂庆活佛遵谕，不久就逃到印度去了。此事发生后，“嘉荫”就强迫四大扎仓的全部僧众个个立誓，保证不再逃跑，若有违犯，没收房屋财产，下狱惩办。立誓人还必须找人作保，保人要在誓书上签押。出了事，保人坐连，而保人又必须是从仆从们中间找来的。尽管采取了种种严厉的措施，但扎寺的许多僧侣和仆从，宁肯抛弃房屋财产，也要相率逃走。他们逃到印度后，再经水路转道祖国内地，不惜历经千辛万苦，去到班禅堪厅那里。其中的一部分人，确实没有必要逃走，但因对噶厦的所作所为产生疑惧，都有大祸将临的预感。这种预感不是没有缘由的。例如：大管家四品官因康和他的副手四品官瑛卜溪、大马官（四品）德绕、四品官德霞瓦、雪仲顿吉米顿、登巴·哲达等人，被噶厦突然召到

拉萨后，以“延误公事”的罪名，被长期管押起来。瑶卜溪在日喀则的家属——公·彭措玉杰及其母亲、妻子等，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便致密信给他在拉萨的恰苏大管家相约出逃。

恰苏从拉萨逃出后，到达江孜，但并没能立即与公·彭措玉杰等人汇合。噶厦的追兵在江孜附近将彭措玉杰逮住了。追兵为了将其一网打尽，依旧让彭措玉杰骑在马上，押着同去追赶恰苏。当恰苏主仆从后面赶来时，与追兵遭遇，互相枪击，不支，即转身从多德地方逃走。他们在山沟里绕了一个大圈，未能逃到国外，又回到了日喀则。噶厦政府得报，立即作了严密部署。结果，这伙逃亡者全被捕获。暂管押在日喀则噶尔康监狱中。几天后，又将他们捆绑在马背上，押解到拉萨，钉上重镣投入狱中。将恰苏等人以“贻误公事”论罪，下狱达四年之久。公·彭措玉杰虽系九世班禅家族，竟也未能幸免此难。

四、关于扎什伦布所属的宗溪庄园 被掠夺的情况

噶厦政府制定的“水猪法令”遭到日喀则僧俗官员和百姓们的反对，一致要求予以废除。扎寺的代表根据实际情况和施行后的大量弊端，向噶厦提出详尽的陈述。但噶厦却置之不理，还罗织了很多罪名，把上书人仲苏·尕绕巴和盘苏·谆切·谆赛巴等人逮捕下狱，囚禁在布达拉宫夏钦角达数年之久。噶厦接着便以“提取拖欠的军费”为由，将扎什伦布所属的拉孜宗、昂仁宗、彭措林宗、康巴宗、谢通门谿卡、美康沙谿、达那仁青孜谿、南伦绕谿、江孜查苦谿等分别予以接管，并勒令所有僧俗办事人员，不管愿去不愿去，均强制其前往，以示警戒。这样一来，扎

什伦布各寺院的收入大为减少，以致于连敬神的供品，做佛事的用费都颇为困难，僧众们的衣食自然也就成了问题。噶厦政府如此对待后藏僧俗民众，但他们还是逆来顺受，从不曾进行过有组织的反抗。主要是遵从班佛临行前的谆谆教诲：谨慎从事，忍让为先，相信万事自有天定，终久会有个出头之日。

回想起九世班禅在扎寺时，曾对那些贬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对噶厦政府中某些权贵图谋报复，而想以暴力进行抗争的人，深恶痛绝，曾多次严加斥责。

面对班佛出走后，噶厦对扎什伦布的种种苛遇压榨，后藏人民已是忍无可忍，上书申诉，皆不被理睬，反而招来更惨酷的报复。为了缓和上述尖锐矛盾，不使赋税完全中断。后藏方面就尽力设法采取了一些安抚人心的办法。例如，经瑞卜谿、德绕、团康、德霞等人共同商定，派出一名专使前往内地，将噶厦政府对扎什伦布的所做所为，向班佛作了详尽汇报，同时也表示愿来内地服侍班佛尽供奉之心愿。不久，班禅的近身侍从大喇嘛阿旺金巴再次来到扎寺（他曾两次被秘密派来联系），亲手把班佛的教令交给了几位在寺堪布。班佛复函说：“……我暂时不需要汝等供应，诸事希善为料理……”。以后，扎寺的扎萨喇嘛亲自前往内地，险些被噶厦发觉出事。当阿旺金巴此番来藏事毕，再次去内地时，在亚东的毕毕塘坝子的一座佛塔旁，被噶厦派驻亚东的基巧（总办）米甲巴发现。米甲巴盘问他：“什么人？到那儿去？”阿旺金巴回答：“是洛巴人。因受封任掌堂师，须送礼祝贺，故去噶伦堡办货。”这个米甲巴仔细打量之后，发话道：“说话不老实，不象洛巴人。好了，滚你的吧！”就这样混了过去。事后据认为，可能是那人因敬重班佛，料知是扎寺的人，有意放行

的。

1933年初，身在内地的九世班禅活佛，为了缓和前后藏的矛盾，专事派堪厅大咒师达尔巴呼图克图（即安钦活佛）和堪仲丹庆巴二人经海路取道印度入藏谈判，意外地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政府的盛情接待。经过前后藏代表认真会谈，提出了解决前后藏主要问题的一些初步方案。适逢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幸圆寂而搁置。九世班禅于1937年圆寂于青海，前后藏的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还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十世班禅才得以返回西藏。前后藏的历史悬案在西藏民主改革后才算自然消失。

注：昔有一颈瘤患者，去蜀如昌就医。因行路困顿，乃酣睡。朦胧中见群仙来聚。一仙人曰：“有酒无肴，奈何”？另一仙人曰：“此人瘤大可佐酒”。乃抽刃割之。后，另一患者至，恰群仙亦至，仍欲割瘤，一仙人曰：“前瘤难食，何如饘。”于是此人颈增一瘤，由一变二，寓一患未除，复添一患。

（宋晓嵇 译）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日

擦珠·阿洛旺桑小传

文史资料编辑部

擦珠·阿旺洛桑活佛出生于1880年（藏历第十六甲子的铁龙年）日喀则贵族德列绕登巴家，系台基定甲的兄长。1957年任《西藏日报社》副总编辑时在拉萨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擦珠·阿旺洛桑活佛五岁那年，入色拉寺擦瓦康村为僧。后来，在一种宗教仪式上，他被认定为甘丹赤巴洛桑格列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六岁时，在色拉寺举行坐床典礼，开始学习佛经。他自幼聪慧过人，且学习非常刻苦。二十一岁那年考上了拉让巴格西学位。以后他遍游西藏各地，拜师学习历史、文学、诗歌、医学和星算等各种学问，尤其对文学、诗歌、藏文文法具有较深的造诣。

擦珠·阿旺洛桑活佛早年曾随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去北京等地游历达五年之久，并同达赖喇嘛一起受到清光绪皇帝的召见。返回西藏后，达赖喇嘛曾派他去过日本。以后他曾任过达赖喇嘛的经师和侍读，并协同格西（一种学位）喜绕嘉措校对过大藏经。

一九五一年底，进军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刚进入拉萨，部队还没有站稳脚跟，年过古稀的西藏学者擦珠·阿旺洛桑活佛（是年他已七十二岁），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志愿参加了革命

工作。起初，他在西藏军区干部学校任付校长，亲自动手编纂教材，担任教学工作。一九五二年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常务委员后，把自己晚年的全部心血，倾注到党所领导的西藏解放事业上。由于当时的中共西藏工委不公开，所办的大小事务，多以西藏军区名义，大事主要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所以叫做“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实际工作人员极少，工作任务很重。主要工作是编译和出版《藏文新闻简讯》，也翻译一些其他资料。那时，也正是西藏上层中一小撮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企图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极其猖狂的时候，擦珠·阿旺洛桑活佛不顾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种种挑衅和威胁，理直气壮地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协议的执行而积极工作。那时候的文字翻译工作十分困难，几乎是没有什么藏译方面的工具书，遇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译文困难，特别是藏汉文互译方面的难题，主要靠擦珠·阿旺洛桑、江金·索朗杰布和格西曲扎几位大学者，凭籍他们渊博的学识，都创造性地予以解决了。如现在两化翻译中所常用的大多数新词汇，就是那时学者们智慧的结晶。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中，擦珠·阿旺洛桑和江金·索朗杰布是主要执笔人，他们在探讨学术和学识上，态度非常严肃慎重，虽然私人关系一直很好，但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确定一个词和一组词汇，却各持己见，经常发生争论，在对方尚未以充分的论据把自己驳倒之前，是丝毫也不肯让步的。一般来说，擦珠·阿旺洛桑活佛是能够倾听别人不同意见的。但是，他也能够做到以自己的渊博学识，拿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把别人说服。深受读者喜爱的《擦珠文法》（藏文），就是出自于那个时候。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凡是他执笔编辑的每篇稿子，都经过